

漢語複數標記在不同接觸模式下的不同演變特徵

徐澤韜、潘俊楠^{*}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在語言接觸視野下，本文採用語料庫考察漢英雙語兒童漢語複數標記是否會受到英語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於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以及漢語學習者，雙語兒童的漢語複數標記幾乎未受到英語的影響。原因在於 1 至 4 歲的兒童尚未習得名詞加複數詞綴結構表示複數的規則，只是將其作為整體詞彙儲存。本文將甘青漢語方言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雙語兒童漢語、晉語及西南官話中的複數表達進行對比，進一步揭示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與阿爾泰語等語言接觸時在微觀層面上發生的變化及原因。

關鍵詞

複數標記，語言接觸，語言習得，漢語方言，語料庫

^{*} 潘俊楠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徐澤韜、潘俊楠。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們”可以與人稱代詞或專有名詞相結合，如例（1），也可以與普通名詞相結合，表示定指，且只能與有生命的名詞兼容，如例（2a）。其中，這類專有名詞及普通名詞主要是指人的（楊炎華 2015）。“們”有時也可以與有生命的指物名詞如“小鳥”共現，但這一般被看作擬人用法。無生命的指物名詞則不能與“們”共現，如（2b）。此外，“們”也不能兼容數量詞，如（3）所示。

- (1) 我們；你們；他／她們；祥子們
- (2) a. 老師們、學生們、小鳥們
b. *蘋果們、桌子們
- (3) *三個學生們

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同的是，甘青地區漢語方言的複數詞綴“們”在長期與阿爾泰語及藏語接觸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於普通話的用法（徐丹 2011；楊永龍 2014；徐丹、貝羅貝 2018 等）。除了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們”還可以與數量詞“幾個”以及無生命的名詞“樹”共現，如（4）（5）所示。

- (4) 甘溝話
雞兒們三個宰了。（殺了三隻雞。）（楊永龍 2014: 251）
- (5) 臨夏話
路邊邊上樹們種下幾個。（路邊上種下幾棵樹。）（《臨夏方言》1996: 171，轉引自李旭平 2022: 828）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了漢語學習者的身上（孔德然、趙楊 2021；Wang & Schwartz 2022）。根據孔德然、趙楊（2021），母語為英語的高水平二語學習者普遍接受“們”與量名結構共現以及與表存現的“有”共現，如例（6）（7）分別所示。

- (6) 明天媽媽會帶兩個孩子們去醫院看病。（孔德然、趙楊 2021: 567）
- (7) 校長剛才看見有學生們在公園裡踢球。（Prawatmuang 2017: 16）

目前，對於兒童雙語者漢語複數詞綴“們”的用法尚且缺乏討論。先前研究中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以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中的複數詞綴“們”均出現了不同於現代漢語普通話“們”的用法，說明語言接觸對“們”的用法極有可能產生影響。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兒童雙語者複數詞綴“們”的用法是否同樣會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同時比

較“們”在三種接觸模式下的演變特徵是否存在差異，並進一步探討語言接觸視角下“們”的表現對其句法分析有何啟示。

2. 漢語和英語複數詞綴的句法語義性質

為方便後續討論，本節將對漢語複數詞綴“們”以及英語複數標記“-s”的句法語義性質進行概述。為擴大研究量本，我們把粵語複數詞綴“哋”也納入探究範圍。

2.1. 普通話複數詞綴

學界對於複數詞綴“們”的句法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們”屬於集合標記 (Iljic 1994; Jiang 2017)；第二類觀點以 Li (1999) 為代表，認為漢語的“們”是複數標記 (Li 1999; Huang et al. 2009; 楊炎華、桑紫宏 2023)；第三類觀點認為漢語存在兩個不同的“們”，人稱代詞和專有名詞後的“們”是集合標記，普通名詞後的“們”是複數標記 (Chao 1968; Norman 1988; Hsieh 2008; 楊炎華 2015)。¹

Iljic (1994) 認為漢語普通話的“們”是集合標記，因為帶“們”的名詞都表示有定。如 (8a) 所示，帶“們”的名詞不能出現在存現句中。“們”可以附著於人名，表示這一人名所指代的集合，如 (8b)。此外，“們”不能與數量結構共現 (呂叔湘 1944)，如 (8c)。²

- (8) a. * 有人們。
b. 張三們在哪裡？
c. * 三個朋友們 (Iljic 1994: 93)

基於漢語 DP 假設 (Tang 1990; Li 1997)，Li (1999) 認為“們”是複數標記，其句法位置屬於數量投射的中心語 Num，位於中心語 D 的名詞成分之後，這可以解釋

¹ 本節主要探討複數詞綴“們”的共時分析，對於“們”的起源，請參看李豔惠、石毓智 (2000)。
² 根據 SGS (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 原則，量詞系統和數標記通常呈互補關係。漢語普通話可以看作典型的“量詞型語言”，英語為“數標記型語言” (李旭平 2022)。對於“三個學生們”不合法而對應的英語 “three students” 合法的原因，Li (1999) 和 Borer (2005) 從句法角度進行了分析。李豔惠、石毓智 (2000) 則從歷時角度探討了為何漢語沒有發展出“數 + 名 + 們”這一結構。李旭平 (2022)、Li 和 Cheng (2025) 進一步探討了甘青漢語“們”可以和數量詞共現 (如 (4)) 的原因。李旭平認為甘青漢語的“們”是修飾型複數標記，屬於 DP 附接語，作用於整個數量段語 NumP，並不與量詞構成互補關係，因而“們”可以與數量詞共現。

人稱代詞後的“們”和普通名詞後的“們”與量化短語共現時的差異。不論數量結構“三個”和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語序如何，“學生們”都不能與數量結構共現，如（9a）（9b）所示。而複數人稱代詞“他們”可以出現在“三個”之前，反之則不行，如（9c）（9d）所示。

- (9) a. * 三個學生們
 b. * 學生們三個
 c. 他們三個（人）
 d. * 三個他們（引自 Li 1999: 79，略有修改）

Li（1999）認為導致這一差異的原因是因為作為有定的複數標記，只有當普通名詞移動到中心語 D 時，“們”才能附著到普通名詞後。量化短語如數量名結構“三個”阻礙了普通名詞由 N 到 D 的移位，因此（9a）與（9b）的結構不合法。代詞“他”作為有定表達，基礎生成於 D，所以“們”可以附著在“他”之後，形成（9c）的結構。（9d）則違反了漢語名詞 [D [Num [Cl [N]]]] 的基本結構。

兩種標記說（Chao 1968; Norman 1988）認為人稱代詞後的“們”是集合標記，普通名詞後的“們”是複數標記。然而這無法解釋人稱代詞加“們”可能存在的歧義。Li（1999）指出例（8b）還可能表達與“張三”同名同姓的其他人的複數語義。如果人稱代詞後的“們”只是集合標記，則無法表達這一複數語義。因此，我們採納 Li（1999）為代表的複數標記說，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們”分析為複數標記。

2.2. 粵語複數詞綴

與普通話“們”不同的是，粵語複數詞綴“哋”的分佈更為受限，只能出現在人稱代詞後面，不能與普通名詞相結合，無論名詞是否具有生命，如例（10）（11）所示。

- (10) 我哋（我們）、你哋（你們）、佢哋（他／她們）
 (11) a. * 學生哋（學生們）
 b. * 書哋（書們）

此外，粵語用於表示複數的還有複數量詞“啲”，類似於普通話的“些”。張慶文、鄧思穎（2014）歸納了粵語“啲”的用法。“啲”可以出現在數詞“一”後面，表達複數意義時數量不確定，如（12）所示。“啲”也能夠出現在形容詞後，表示程度或者數量上的些微，與普通話“點兒”或者“一些”用作程度副詞時相似，如例（13）所示。

(12) 有（一）啲人（有一些人）

(13) 高啲（高點兒、高一些）、多啲（多點兒、多一些）

不同於“些”的是，“啲”可以出現在名詞之前，表示名詞的有定及複數含義，如（14）所示。假設張三碰見了一些跳高運動員，運動員都很高，張三便可用（14b）來表示“籃球運動員們都很高”。³

(14) a. 普通話：* 些人很高。

b. 粵語：啲人好高。（（這些）人很高。）

張慶文、鄧思穎（2014）認為在句法上，“啲”應該已經由 CL 的位置移動到了 D 的位置（Zhang & Tang 2010;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在 D 的位置上，“啲”既表示有定，也表達複數含義。因此，他們認為“啲”是一個有定的複數標記，對應普通話中出現在普通名詞後的“們”。至於人稱代詞後的複數詞綴“哋”則對應了普通話人稱代詞後的“們”，張慶文、鄧思穎（2014）將其分析為集體標記，因為其表達的都是以人稱代詞為參照的群體意義。普通話的“們”可視作是粵語集體標記“哋”和名詞短語前的複數量詞“啲”的複合體。

2.3. 英語複數詞綴

不同於普通話的“們”以及粵語的“哋”，英語的複數標記“-s”具有極高的能產性，可以作為詞綴附加於任何可數名詞後面，無論有生或無生名詞。如例（15a）（15b），“-s”既可以附著於無生命的名詞“apple（蘋果）”後面，也可以附著在有生命的名詞“cat（貓）”之後。此外，英語的“-s”與定指表達無關，可以出現在存現句中，如（15c）所示。

(15) a. three apple-s（三個蘋果）

b. two cat-s（兩隻狗）

c. There are three students.（有三個學生。）

英語也存在不少不規則複數形式，如例（16）所示。單數與複數可能採用同一種形式，如“sheep（羊）”，與漢語普通名詞無單複數區別類似。不規則複數形式是兒童語言習得以及二語習得過程中的一個難點（Mervis & Johnson 1991; Jia 2003）。

³ 並非所有粵語分支的“啲”都有此類用法，根據張慶文、鄧思穎（2014），粵西廉江方言不能接受“啲”出現在名詞前的用法，但是廉江話的“呢”與“啲”的語義和句法分佈一致。

- (16) a. 單數：foot, leaf, sheep (腳，葉子，羊)
 b. 複數：feet, leaves, sheep (腳，葉子，羊)

英語的複數標記“-s”和普通話“們”的一個相似之處在於複數人稱代詞可以出現於數詞之前，如(17a)。這一點與普通話的複數人稱代詞出現於數量結構前相似，如(17b)。

- (17) a. I saw them three left. (我看到他們三个走了。)
 b. 我看到他們三个走了。

通過比較漢英複數詞綴的分佈，Li (1999) 認為二者實現複數型態的句法方式存在差異。複數詞綴都位於 NumP 的中心語位置 (Ritter 1991; Wilschko 2008, 2014)，然而普通話是通過名詞 N 移位到 D 實現複數型態並且表示定指，英語中的名詞 N 則無需移動到 D 實現複數型態。

本節梳理了普通話複數詞綴“們”、粵語複數詞綴“哋”以及英語複數詞綴“-s”的句法語義性質。釐清了三個複數詞綴的異同後，下一節將對雙語兒童的複數詞綴表達進行探究。

3. 本文研究

本文採用語料庫研究的方法，對世界上最大的兒童語料庫 CHILDES (MacWhinney 2000) 中漢英雙語兒童的漢語複數詞綴表達進行定量研究。共選取 10 位被試，普通話英語雙語者 2 位，粵語英語雙語者 2 位，普通話單語者及粵語單語者各 2 位作為對照。為擴大樣本數量，我們將語料庫中的 2 位普通話粵語英語三語兒童也納入考量範圍。一般來說，雙語者和三語者的數據不能進行直接比較，因為三語者通常會受到更多因素影響。早先研究認為三語者的第三語言（最後習得的語言）會受到一語的影響，而 Bardel 和 Falk (2007, 2012) 提出的二語階段因素假設 (L2 Status Factor) 則認為在第三語言學習的早期過程中，二語的語言特徵會更容易遷移至第三語言中。與之不同的是，類型首要模型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Rothman 2011, 2015) 認為三語學習者的第三語言會受到一語和二語兩者間在語言類型上與三語更為接近的那門語言所影響，而並非一語或二語中的優勢語 (dominant language)。例如有兩位三語法語學習者，第一位的一語是漢語，二語為英語。第二位的一語是英語，二語為漢語。他們的三語法語習得都會受到英語的影響而非漢語，因為英語跟法語在語言類型上更為接近。對本文來說，不論採取何種三語習得模型，普通話和粵語同屬漢語族，在類型上與英語都存在較大差異。且語料庫中的兒童皆為同時性三語者 (simultaneous trilingual)，在

二語和三語習得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我們認為在本研究中將普粵英三語者納入考量範圍與漢英雙語者進行比較是可行的。

在雙語習得理論中，Hulk 和 Müller (2000) 提出的跨語言影響 (cross-linguistics influence) 具有廣泛影響力。這一理論認為跨語言影響的產生需要滿足結構重合 (structural overlap) 以及界面條件 (interface condition)。結構重合指兩個語言系統需要在表層結構上有部分重疊，界面條件指跨語言影響需要發生在兩個語法模塊 (modules of grammar) 的接口，尤其是句法語用界面。後續研究則發現跨語言影響也可以出現在句法語義界面 (如 Fernández Fuertes & Licerias 2010; Serratrice et al. 2009)。Yip 和 Matthews (2000, 2007) 更進一步提出甚至在不滿足結構重合的條件時也可能發生跨語言影響。在本研究中，普通話“們”、粵語“哋”以及英語“-s”都是作為尾綴附著在名詞後，滿足結構重合的條件。複數詞綴處在句法和語義接口，其中複數詞綴“們”和“哋”都表達定指，更是位於句法、語義和語用的三重接口，滿足界面條件。因此，根據 Hulk 和 Müller (2000) 的理論，我們預測多語兒童漢語複數詞綴的使用應該會受到英語複數詞綴的影響。具體表現為：(i) 普英雙語以及普粵英三語兒童的普通話複數詞綴“們”可能會產生與量名共現，與無生命名詞共現以及出現在無定環境中的現象，與甘青漢語以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相似；(ii) 粵英雙語兒童以及普粵英三語兒童的粵語複數詞綴“哋”可能會出現附接於名詞後的用法，但是由於粵語複數標記“哋”的分佈較普通話的“們”更為狹窄，因此這一用法出現的次數可能會少於普英雙語兒童的“們”。

3.1. 語料提取

在進一步敘述前，界定何種語言為優勢語對判定雙語者的類型至關重要 (Romaine 1995)。通常來說，MLU (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平均語句長度)、最長語句長度以及詞彙類別 (word types) 是用來界定兒童雙語者哪一門語言為優勢語的參照 (Genesee et al. 1995; Deuchar & Muntz 2003)。運用上述標準界定優勢語的一個條件是這一標準在兩種語言中必須是可比較的 (De Houwer 1998: 258)，如果兒童習得的一種語言是黏著語，另一種是孤立語，那麼便不能應用 MLU 進行比較，因為黏著語中單個詞語的複雜度遠遠高於孤立語的單個詞語 (Döpke 1998)。不過 Yip 和 Matthews (2000, 2007) 認為儘管漢語屬於孤立語，英語屬於屈折語，MLU 仍然可以作為界定漢英雙語兒童優勢語的標準。因為在兒童語言習得的早期階段，英語的屈折手段以及不同形態變化還沒有得到完全發展。而漢語本身也並非完全孤立，其中也存在一些黏著語素，如粵語的體標記“zo2”。因此，兒童的漢語和英語可以被視作孤立語進行比較。除此之外，Yip 和 Matthews (2006) 對香港雙語兒童語料庫的研究發現，粵英雙語兒童句法遷移 (syntactic transfer) 的方向是從高 MLU 語言到低 MLU 語言，證明了運用 MLU 界定優勢語的可行性。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 MLU 作為界定漢英多語兒童優勢語的標準。所選取的被試兒童信息如表 1 所示。對於兩位普英雙語兒童來

說，儘管她們普通話的話語總數量更高，但是其英語的 MLU 都高於普通話的 MLU，以英語為優勢語。兩位粵英雙語兒童中，Alicia 以粵語為優勢語，而 Llywelyn 的粵語和英語 MLU 幾乎沒有差異，不存在何種為特別優勢的語言。三語者 Leo 的普通話和粵語相對英語更具優勢，而 Winston 的英語 MLU 最高，屬於優勢語。⁴

表 1 被試信息

被試	性別	年齡	普通話 (MLU)	粵語 (MLU)	英語 (MLU)
普通話					
Xue'er	F	0;08.00 - 4;05.00	8330 (3.529)		
Tong	M	1;7.18 - 3;4.9	9167 (3.21)		
粵語					
Jenny	F	2;08;10 - 3;08.09		7501 (3.245)	
Chunyat	M	1;10;08 - 2;10;27		9269 (2.38)	
普通話 - 英語					
Avia	F	2;00.15 - 3;11.29	4986 (3.695)		1199 (5.045)
Luna	F	2;00.05 - 4;11.06	9183 (3.033)		2871 (3.778)
粵語 - 英語					
Alicia	F	1;03.10 - 3;00.24		5885 (2.806)	3493 (1.959)
Llywelyn	M	2;09.23 - 4;06.07		4086 (2.683)	3841 (2.694)
普通話 - 粵語 - 英語					
Leo	M	1;06.00 - 2;11.21	3654 (2.417)	4402 (2.362)	3814 (2.05)
Winston	M	1;07.04 - 3;07.19	2788 (2.467)	3575 (2.425)	2392 (2.92)

MLU 括號前的數字表示兒童語料中這一種語言產出句子 (utterance) 的總數量。

下一步，我們對兒童語料中的複數詞綴數據進行提取，包括漢語人稱代詞及普通名詞加複數詞綴“們”或“哋”以及英語名詞加複數標記的結構，結果如表 2 所示。兒童的確產出了許多複數詞綴“們”以及“哋”的結構。然而與前文預測不同的是，兒童語料中的漢語複數詞綴，絕大多數都出現在人稱代詞後面，只有普通話單語兒童 Tong 以及三語兒童 Leo 的普通話語料中出現了普通名詞加複數詞綴“們”的結構，次數也屈指可數。在人稱代詞加複數詞綴“哋”結構上，粵語單語和粵英雙語兒童這一結構出現的數量遠小於對應結構在普通話單語和普英雙語兒童出現的數量。不同的是，在兩位普粵英三語兒童中，都是粵語人稱代詞加“哋”結構出現的數量略高於對應結構在普通話中出現的數量。普英雙語兒童中，“們”出現的次數高於英語名詞加複數標記出現的次數；而粵英雙語及三語兒童則相反。由於被試數量不多，無法進行組間

⁴ 兒童語料來源：Xue'er (張莉、周兢 2009)，Tong (Deng & Yip 2018)，Jenny 和 Chunyat (Lee et al. 1996)，Alicia 和 Llywelyn (Yip & Matthews 2007)，Leo (Mai & Yip 在審)，Luna、Avia 和 Winston (Mai et al. 2024)。

的統計學分析。但是兒童語料出現普通名詞加“們”的結構幾乎趨近於零，與人稱代詞後加“們”出現的數量有較大差異。因此，我們認為描寫性的數據依舊可以作為兒童複數詞綴研究的參考。

表 2 複數詞綴在兒童語料中的分佈情況

被試	人稱代詞 + 們 / 哋	普通名詞 + 們 / 哋	英語名詞 + PL
普通話			
Xue'er	185	0	
Tong	138	1	
粵語			
Jenny	15	0	
Chunyat	10	0	
普通話 - 英語			
Avia	221	0	116
Luna	136	0	78
粵語 - 英語			
Alicia	41	0	111
Llywelyn	13	0	83
普通話 - 粵語 - 英語			
Leo	44/68	2/0	110
Winston	70/106	0/0	110

下一步，我們將語料中普通名詞加“們”的句子提取出來進行具體分析。對於單語者 Tong 來說，出現的唯一一例普通名詞後加“們”的用法與現代漢語一致，如（18）所示，並且沒有出現兒童英語習得中常見的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現象（Maslen et al. 2004; Zaretsky et al. 2016）。⁵

（18）Tong：它們去上學吧，小動物們去上學嘛，好不好啊？（030012）

對於普粵英三語者 Leo 來說，例（19）的用法同樣符合現代漢語語法。而例（20）則出現了量詞與複數標記“們”共現以及“們”出現在無定環境中的用法，與甘青地區漢語方言和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相似。然而如果將語境中父親的語言輸入（*input*）考慮進來，我們推測 Leo 的回答很可能是對父親“同學們”一詞的重複。且“些”作為集合量詞或量化詞綴，本身要求後面出現的名詞表達複數含義（Li 1999）。

⁵ 兒童語料例句末尾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兒童的年齡，如 030012 表示兒童此時是三歲零十二天，以此類推。

(19) Leo：乘客們小心啊。(020626)

(20) FAT：那同學們都來了沒有啊？

Leo：有些同學們來了。(021023)

我們推測，雙語兒童複數詞綴“們”的使用情況和單語兒童差別不大，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種猜想是，現階段兒童很可能並未習得“們”作為複數詞綴的用法，而是將名詞加“們”的結構作為一個詞彙去進行整體記憶。第二種猜想是，位於人稱代詞後的“們”與普通名詞後的“們”不同，如兩種標記說（Chao 1968; Norman 1988; Hsieh 2008）所分析的。因此，儘管兒童語料中出現了許多人稱代詞加“們”的結構，由於其與普通名詞後的“們”性質不同，所以兒童並未受到英語複數標記的跨語言影響。

為進一步探究兒童複數詞綴的習得情況，我們提取了家長及看護人的漢語複數詞綴數據，以探究兒童語言輸入對兒童複數表達的影響，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兒童複數詞綴語言輸入與兒童語言產出的情況基本相符。在所有被試的複數詞綴輸入中，都是人稱代詞加“們”出現的次數遠高於普通名詞加“們”。值得注意的是，普英雙語兒童Luna的普通名詞加“們”的輸入共有20例，然而Luna卻並未產出類似結構。普通話單語兒童Tong和三語兒童Leo的普通名詞加“們”輸入數量分別為6例和8例，少於Luna語言輸入的20例，但是這兩位兒童卻出現了相應的用法。

表3 兒童漢語語言輸入中的複數表達情況

被試	人稱代詞 + 們		普通名詞 + 們		人稱代詞 + 哋		普通名詞 + 哋	
普通話	CHI	PAR	CHI	PAR	CHI	PAR	CHI	PAR
Xue'er	185	554	0	0				
Tong	138	808	1	6				
粵語								
Jenny					15	498	0	0
Chunyat					10	233	0	0
普通話 - 英語								
Avia	221	391	0	3				
Luna	136	722	0	20				
粵語 - 英語								
Alicia					41	306	0	0
Llywelyn					13	266	0	0
普通話 - 粵語 - 英語								
Leo	44	517	2	8	68	340	0	0
Winston	70	640	0	5	106	637	0	0

CHI：兒童；PAR：家長

3.2. 數據分析

對 3.1 節中提取出來的兒童語料數據進行總結，我們看到，三組兒童的複數詞綴“們”或“哋”幾乎都出現於人稱代詞之後，只有普通話單語兒童 Tong 和三語兒童 Leo 出現了共計 3 例普通名詞加“們”的用法。多語兒童普通話和粵語的複數詞綴似乎完全沒有受到英語複數標記“-s”的影響，與二語學習者截然不同。此外，在兒童語言輸入中，普通話人稱代詞加“們”出現的頻率也遠遠大於普通名詞加“們”。粵語的“哋”本身不能出現在普通名詞後，因此只有人稱代詞加“哋”的結構。我們認為雖然複數詞綴“們”或“哋”出現的絕對次數很多，但兒童很可能只是將人稱代詞加複數詞綴作為一個整體詞彙來進行記憶，而並沒有習得複數詞綴“們”或“哋”可以和普通名詞結合的規則。運用 Yang (2005, 2016) 提出的寬容準則 (Tolerance Principle)，我們可以對此做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寬容準則假設在兒童語言習得中，當採用一個普遍能產性規則 (general productive rule) 比單獨儲存詞彙形式更高效時，就會形成這一規則。從計算效率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的角度來看，只有當例外項數量 (e) 少於項目數量除以該數量 (N) 的自然對數時，才能更高效地形成一個普遍能產性規則，如 (21) 所示。計算效率則是通過比較形成規則需要的時間與訪問每個詞彙所需要的時間來決定。

(21) 寬容準則計算公式

$$e \leq \theta_N \text{ where } \theta_N := \frac{N}{\ln N}$$

以英語的過去式“-ed”為例，在習得過程中，兒童面臨兩個選擇：(i) 單獨儲存詞彙：按出現頻率排列，將每個動詞過去式形式單獨儲存在一個列表中，每次需要表達動詞的過去式時都要搜尋此列表；(ii) 形成能產性規則：只將例外項按頻率排列儲存在一個列表中，需要表達動詞的過去式時，學習者首先搜尋例外項列表，如果目標動詞不在例外項列表中，學習者就應用加“-ed”的規則。Yang (2016) 統計了 CHILDES 語料庫中幼兒導向式 (child directed) 英語的數據共 500 萬字，發現其中存在 1022 例不同的過去式動詞形式。根據寬容準則計算公式得出形成加“-ed”的規則所能夠允許的例外項數量為 147 例，而 Yang (2016) 發現這些過去式動詞形式裡例外項的數量為 127 例，處在寬容準則允許的例外項數量範圍內。因此，兒童習得了過去式標記的能產性規則。

Schuler et al. (2016) 運用人工語言實驗對寬容準則進行了進一步檢驗。實驗者虛構了 9 個沒有意義的名詞以及一個複數標記“-ka”。測試名詞出現的頻率與數量依照

齊夫定律 (Zipfian distribution) 分佈。⁶ 根據寬容準則預測，當被試兒童所接受的語言輸入例外項少於 4 例時，兒童能夠形成能產性規則，反之則不能。對此，實驗者將被試兒童分為兩組，第一組接受 5 個規則複數名詞及 4 個不規則複數名詞的語言輸入，其中規則複數名詞共出現 37 次，不規則複數名詞出現 12 次。第二組接受 3 個規則複數名詞及 6 個不規則複數名詞的輸入，其中規則複數名詞共出現 29 次，不規則複數名詞共出現 20 次。兩組中的規則複數名詞出現次數均大於不規則複數名詞出現的次數。結果顯示，第一組兒童能夠將複數標記的規則運用於新的名詞。第二組兒童則不能，儘管他們所接受的 3 個規則複數名詞的總出現次數仍然大於 6 個不規則複數名詞出現的總次數。這進一步驗證了寬容準則的有效性，說明兒童語言習得遵循寬容準則。重要的是，兒童習得某一結構的產出性取決於這一結構在兒童語言輸入中類型 (type) 數量的多少，而不是總體數量 (token) 的多少 (Baayen & Renouf 1996)。

因此，我們進一步統計了兒童語言輸入中普通名詞加“們”這一結構的具體類型及數量，如表 4 所示。次數指普通名詞加“們”結構出現的總次數，項目數量表示這一結構出現的類型有幾種。

表 4 兒童語言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輸入與產出

被試	普通名詞 + 們 (兒童語言輸出)		普通名詞 + 們 (兒童語言輸入)		
	次數	具體名詞	次數	項目數量	具體名詞
Tong	1	動物們	6	3	小鳥們、動物們、朋友們
Avia	0		3	1	老鼠們
Luna	0		20	8	客人們、夥伴們、朋友們、媽媽們、姐姐們、賓客們、小動物們、市民們
Leo	2	同學們、乘客們	8	6	先生們、女士們、夥伴們、動物們、同學們、乘客們
Winston	0		5	2	朋友們、姐姐們

以兒童語言輸入中普通名詞加“們”結構出現項目數量最多的 Luna 為例，倘若暫且不論人稱代詞後“們”與普通名詞後“們”的區別，加上人稱代詞加“們”結構的 3 種項目，“我們、你們、他/她們”，那麼 Luna 所接受到的名詞加“們”結構的

⁶ 自然語言中詞語出現頻次的分佈大致依照齊夫定律 (Schuler et al. 2016)。在這裏，齊夫定律指的是出現頻率第二高的名詞數量約為出現頻率第一高的名詞數量的一半，出現頻率第三高的名詞數量則為第二多一半，以此類推。

項目數量為 11。根據寬容準則，生成普通名詞加“們”的普遍能產性規則所允許的例外項數量 e 取整為 5，如 (22) 所示。

$$(22) e \leq \frac{11}{\ln 11} \approx 4.58826$$

對於漢語普通話來說，所有不加複數詞綴“們”表示複數的結構都會被視作例外項。在普通話中，光桿名詞既可以表示單數也可以表示複數，如 (23a) 和 (23b) 都可以表達不止一位老師。更多時候，漢語的複數形式通過數量名結構來表示，如 (24)。因此，光桿名詞表達複數以及數量名結構表示複數的情況都會被視作例外項。⁷

(23) a. 老師要開會。(一位或多位老師)

b. 老師們要開會。(多位老師)

(24) 一些老師在開會。

對於 Luna 來說，如果存在 5 例以上的例外項語言輸入，便可以說明她沒有形成名詞加“們”結構的普遍能產性規則。結果顯示，Luna 語言輸入中例外項的數量已經超出了寬容準則所允許的 5 例。我們選取了 7 例以作示範，(25) 中的“樹”和“花花”表複數，(26) 中的光桿名詞“蘋果”並不區分單複數，(27) 領屬結構中的名詞“腳”為複數，(28) 中的餃子表複數，(29) 的數量名短語均表示複數，(30) (31) 中的“些”加名詞均表複數。

(25) MOT：哇，這裡有好多樹好多花花。(020422)

(26) MOT：你要吃蘋果？

CHI：我要吃蘋果。(020801)

(27) FAT：那蟲蟲的腳呢？

CHI：蟲蟲的腳，腳可能是有的。(020916)

(28) MOT：那你先把餃子吃完。

CHI：我吃鴨梨吧。(030422)

(29) MOT：你記不記得那五隻小青蛙坐在 / 站在石頭上。(030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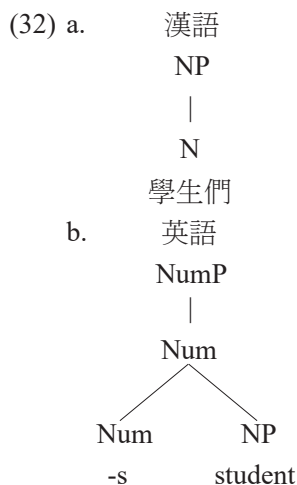
(30) MOT：這些線怎麼了？(030425)

(31) MOT：那這裡有哪些小動物？(030529)

⁷ 由於名詞加“們”結構的數量非常有限，在這裏我們暫且不論名詞處在主語還是賓語位置，同樣也不考慮例外項是否表示定指。在現階段，這對兒童是否能習得普通名詞加“們”結構表示複數的普遍性能產規則並沒有直接關係。

因此，儘管人稱代詞加“們”結構出現的整體數量不少，由於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語言輸入類型數量太少，Luna 在現階段並沒有習得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普遍能產性規則，從而也沒有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語言輸出。有一個問題是，Tong 與 Leo 的普通名詞加“們”結構的語言輸入數量比 Luna 更少，但是他們依舊產出了普通名詞加“們”的結構。我們認為，Tong 與 Leo 的普通名詞加“們”結構只是對父母語言輸入中這一結構的簡單重複。如表 4 所示，Tong 與 Leo 的普通名詞加“們”與其接收到的語言輸入中的名詞類型相一致，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將“們”附著於新的名詞類型之後。我們可以通過例（20）清楚看到，Leo 很可能只是單純重複了父親問話中“同學們”這一表達，而並未意識到“同學們”表達了定指含義，將其與表示存在的“有”相結合。所以，這進一步驗證了我們先前的猜想一，兒童很可能是將人稱代詞加“們”以及普通名詞加“們”作為一個整體詞彙來進行記憶，而非將“們”當作複數詞綴。同理，粵語的複數詞綴“咁”本身不能與任何普通名詞結合，只有人稱代詞加“咁”三種規則複數表達形式，分別為“我咁、你咁、佢咁”，便更不可能形成名詞加“咁”的普遍能產性規則了。

重要的是，由於這一階段兒童將名詞加“們”作為整體詞彙記憶，“們”以及“咁”對於兒童來說並不是能產的複數詞綴。我們認為“們”還無法作為數量投射（NumP）的中心語 Num，與英語的複數標記“-s”沒有形成結構重合。以（32）為例，在這一階段，（32a）中漢語的“學生們”屬於一個名詞中心語，（32b）中英語的複數詞綴“-s”則作為 NumP 的中心語，名詞“student”移位到中心語 Num 的位置去實現複數特徵（Li 1999）。



本節通過 Yang（2005, 2016）提出的寬容準則（Tolerance Principle）證明了前文所述的猜想一，即在 1 至 4 歲的兒童語言習得中，由於漢語名詞加複數詞綴的語言輸

入類型太少，兒童沒有習得名詞加複數詞綴表示複數的普遍能產性規則，只是單純將名詞加複數詞綴作為整體詞彙進行儲存。兒童整體詞彙中的“們”不是複數詞綴，跟英語的複數標記“-s”沒有形成結構重合。因此，本研究中的雙語及三語兒童的漢語複數詞綴表達並沒有受到英語影響。

4. 複數詞綴“們”在不同語言接觸模式下的比較及其理論意義

釐清了多語兒童漢語複數詞綴的習得情況後，我們便可以將其與甘青漢語方言以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中的複數標記表達進行比較。根據一位匿名審稿人的建議，我們也將晉語和西南官話等其他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一同納入考察範圍，豐富複數標記的比較鏈。

在語言接觸視野下，前人對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複數標記已有諸多研究。李克郁（1987）認為青海漢語中“們”的用法與土族語的複數標記“-sge”和撒拉語的複數標記“-lar/ler”很相似，進而推測青海地區以阿爾泰語為母語的說話人在轉用漢語時，按照母語習慣來使用漢語“們”，這種形式便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語言成分保留下來。楊永龍（2014）指出甘溝話複數範疇覆蓋的範圍與蒙古語一致，不僅可以用於人稱代詞、指人名詞，也可以用於無生名詞，這表明甘溝話很可能受到了蒙古語的影響。借用 Heine 和 Kuteva（2003）的語法複製觀點，敏春芳、李小潔（2023）認為臨夏話複數標記“們”是在語言接觸中模仿了模型語蒙古語族中的東鄉語複數標記“-la”形成的。此外，一些學者也認為甘青漢語方言的複數標記還受到了藏語的影響。謝曉安等（1996）通過系統對比臨夏方言、安多藏語以及蒙古語的複數標記，認為臨夏方言複數標記受到了安多藏語和蒙古語的影響。Simon 和 Noûs（2021）考察了安多地區漢方言（臨夏、循化、甘溝話）、安多藏語、蒙古語及突厥語的複數表達，認為安多地區漢語方言的複數標記能用於指物名詞，是受到了藏語、突厥語和蒙古語共同影響的結果。這些研究表明阿爾泰語和藏語對甘青地區漢方言複數標記的使用產生了影響。

至於阿爾泰語和藏語對甘青地區漢語複數標記的影響程度哪個更大，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判斷依據。我們推測或許阿爾泰語的影響比藏語更大。結合甘青地區移民史，徐丹、貝羅貝（2018）認為甘青地區語言的歷史層次應該劃分為：第一層藏語，第二層蒙古語，第三層漢語。這一地區最早由吐蕃為首的非漢民族主導，因此以藏語為底層。在 13 世紀蒙古人統治後，轉而以蒙古語為主導。漢語的影響則主要自 20 世紀開始，到現在漢語成為甘青地區的優勢語。從歷史發展來看，當漢語開始作為甘青地區的上層語言時，藏語已失去優勢地位，而蒙古語作為當時的優勢語言對漢語產生了諸多影響。從宏觀角度看，蒙古語族的句法特徵在甘青地區占優勢。楊永龍（2014）指出，元明時代的北方文獻中，存在許多“們”標記動物和無生名詞的現象（見太田辰

夫 1958；孫錫信 1990 等），而同一時期的南方文獻則不存在這一現象。由此可以看出阿爾泰語對北方漢語的影響。此外，儘管五屯話中存在較多安多藏語句法特徵，Sandman（2012）發現，五屯話在複數標記上的特徵與蒙古語族中的保安語更為一致。因此，阿爾泰語對甘青地區複數標記的影響程度可能比藏語更大，不過這一猜想還有待後續微觀層面的進一步考察。

與甘青地區漢語方言相似，晉語區中的一些複數標記不僅可以用於人稱代詞、指人名詞，也可以用於無生指物名詞，如山西汾陽話（武旭 2019；楊炎華、劉道海 2023）、山西高平話（韋志剛 2024）、山西屯留話（張芹 2020: 29）中的複數標記“都”。冀魯官話中的河北武邑話也存在類似用法（張曉靜、陳澤平 2015）。在歷史上，山西自古以來便與匈奴、突厥有頻繁接觸，晉語中也有不少阿爾泰語底層殘留。邢向東（2018）認為晉語繼承了十余種元白話的語法結構，其中便包括複數標記“每”。史秀菊、王海立（2024）也提出晉語的“們”類成分應該來自於阿爾泰語。同樣，李圃（2017）認為河北漢語方言如唐山話、武邑話中的複數標記很可能如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一樣，也受到了阿爾泰語影響。

部分西南官話中的複數標記也可以用於無生命的指物名詞。肖黎明（1990）發現，貴州沿河話的複數標記“些”可以用在指物名詞後表複數，從普通話借來的“們”則不行，“們”只能用於指人名詞。胡光斌（2006）指出，遵義方言的複數標記“些”可用於指物名詞而不能用於人稱代詞，而“們”只能用於人稱代詞或專有指人名詞。同樣，吳偉軍（2023）發現貴州安順方言的“些”也能用於指物名詞但不能附加在人稱代詞後。

通過比較上述晉語、西南官話和甘青漢語方言的複數標記，我們可以發現，晉語、甘青漢語方言複數標記的使用範圍更為相似，西南官話的複數標記雖能用於無生名詞，卻普遍不能用於人稱代詞後。此外，與晉語、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不同的是，貴州等地的西南官話顯然缺乏與阿爾泰語密切接觸的條件，為何這些方言區的複數標記也發展出了可以用於無生名詞的用法？丁加勇、沈禕（2014）考察了同屬於西南官話的湖南鳳凰話，發現鳳凰話中的後置複數指示詞“這些、果些（那些）”附加於名詞後時可以表連類複數和一般複數，且表示定指。其中“這”、“那”的讀音及指示功能已經弱化。基於這一現象，丁、沈提出，西南官話中的複數標記“些”是由後置複數指示詞語法化而來，其過程為：複數指示詞 → 同位短語中表連類指示 → 後置列舉助詞 → 連類複數 → 真性複數。鳳凰話的“這些、果些（那些）”仍保留了指示詞，雖然其指示功能已經弱化或消失，但還沒有完全語法化成“些”。吳偉軍（2023）認為安順和貴陽等地的複數標記“些”已經處在後置複數指示詞語法化的后期階段，發展出了單音節的“些”。而多音節複數標記的省略，是構成單音節複數標記的重要手段（汪化雲 2011a, 2011b）。

因此，儘管甘青漢語、晉語中的複數標記與西南官話中的複數標記有著相似表現，二者的來源卻不相同。前者是通過與其他語言如阿爾泰語接觸產生，而後者則是通過複數指示詞語法化而來。我們認為二者的不同來源恰恰可以解釋為何西南官話中的複數標記“些”不能用於人稱代詞。在句法上，人稱代詞和指示詞分別位於名詞中心語和名詞標定語（Specifier）的位置。Koopman（1993）指出，名詞結構的中心語和標定語不能同時出現顯性成分。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在漢語和英語裡，指示詞和人稱代詞不能同時出現於一個名詞結構中，如不能說“這我、那你（this I/that you）”、“這些我們、那些你們（these we/those you）”。鳳凰話的“這些、果些（那些）”也不能出現在人稱代詞後（丁加勇、沈禕 2014）。既然西南官話中的“些”由複數指示詞語法化而來，“些”自然不能出現在人稱代詞後。西南官話雖然也受漢語普通話接觸影響借用了“們”，但普通話“們”的使用範圍較“些”更受限制，不能用於無生指物名詞，便更不可能促使“些”產生用於無生名詞後的用法。

與西南官話不同，甘青漢語方言、晉語中的複數標記受其他語言影響，其接觸模式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相似。孔德然、趙楊（2021）對漢語學習者複數詞綴“們”的用法進行了研究，根據特徵重組假說（Lardiere 2009），不論“們”的性質是什麼，二語學習者都會將其映射至母語中句法語義與其最相似的詞項。以英語複數詞綴為例，英語的“-s”只具有[+ 複數]的特徵，並無對名詞生命度的限制，而漢語普通話的複數標記“們”具有[+ 複數]、[+ 指人]、[+ 定指]、[- 量詞短語]的特徵。以英語為母語的二語學習者將“-s”的[+ 複數]特徵遷移至漢語普通話的“們”，因此這些二語學習者能夠接受如例（6）（7）等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不合法的句子。重要的是，“們”在表達複數時的非強制性使得漢語學習者很難直接利用負面證據的幫助習得“們”的其他特徵，即便是超高水平的漢語學習者也未能接近漢語母語者的判斷。我們認為，甘青漢語方言和部分晉語區的複數標記“們”的表現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相似，是因為二者的接觸模式類似。甘青及晉語區的漢語使用者，如二語學習者一般，將阿爾泰語、藏語複數表達的特徵遷移至普通話的“們”，而且由於普通話“們”的非強制性，使得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也沒能完全習得普通話“們”的用法，如同高水平的二語學習者一般。敏春芳、李小潔（2023）也指出，甘青地區的少數民族轉用漢語或兼用漢語的時候，將母語複數標記的使用規則運用了在漢語複數標記“們”的身上。因此，這一用法便保留下來，形成了如今甘青地區漢方言複數標記“們”與現代漢語“們”的不同用法。

對於漢英多語兒童來說，在接觸模式上，本文探究的多語兒童屬於同時性雙語者（simultaneous bilingualism），而二語學習者屬於順序雙語者（sequential bilingual）。順序雙語者會將母語的複數標記特徵遷移至二語，而同時性雙語者的多語學習模式與二語學習者不同。本文研究發現在1至4歲階段，即便是在英語更為強勢的多語兒童

中，兒童普通話“們”或粵語“哋”的表達也並沒有受到英語影響，是因為兒童還未習得“們”作為複數詞綴的用法。在這一時期，兒童將“們”與名詞結合產生的結構作為整體詞彙記憶。“們”並不處在 NumP 的中心語 Num，與英語的複數標記“-s”沒有形成結構重合，從而也沒有產生跨語言影響（Hulk & Müller 2000）。假設兒童在後期語言習得階段接受了足夠多的複數詞綴“們”所附著的名詞類型，那麼英語的複數詞綴“-s”便可能會對兒童漢語的“們”產生影響。王浩銘、張和友（2022）對 9 名普通話兒童的圖片選擇測試顯示，當研究者使用含有人造名詞加“們”的測試句向兒童描繪圖片上的動作場景時，3 歲兒童尚不能夠選擇正確的圖片，而 4 歲兒童則基本能夠選擇對應的圖片，這表明兒童可能要到 4 歲時才能夠較好地習得“們”作為詞綴的意義。我們研究的語料庫中被試兒童年齡大多在 4 歲以下，即使兒童能夠正確理解複數詞綴“們”的語義，也並不能直接表明兒童一定能夠產出“們”的合法結構，需要後續語料庫的追蹤研究或是誘導產出實驗來進一步檢驗。這一發現也從側面說明，語言接觸對複數標記的影響是一個長期過程。

比較複數詞綴“們”在不同語言接觸類型中的不同表現對“們”的句法理論分析亦有啟示作用。二語使用者以及甘青漢語方言使用者的“們”受母語影響，在結合普通名詞的使用上產生了非常多不同於普通話的用法，說明普通名詞後的“們”可能與英文“-s”或阿爾泰語系中的複數標記相類似，更應該分析為複數標記（如 Li 1999；Huang et al. 2009；楊炎華、桑紫宏 2023），而非 Iljic（1994）及 Jiang（2017）認為的集合標記。至於兩種標記說（Chao 1968; Norman 1988; Hsieh 2008）以及猜想二，即多語兒童沒有受到英語的跨語言影響是因為人稱代詞後的“們”是集合標記，本研究的數據尚不能從語言接觸角度對此做出檢驗。我們已經發現兒童在現階段很可能並未習得“們”作為複數詞綴的用法。儘管兒童語料中人稱代詞加“們”出現次數非常多，兒童詞庫中的“們”可能只是與所附著的代詞或名詞一起作為整體詞彙儲存在大腦中。兒童在什麼階段能夠習得人稱代詞加“們”與普通名詞加“們”的區別還需要未來語言學實驗或語料庫研究進一步探討。

5. 結論

在語言接觸視野下，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漢語普通話複數標記“們”在雙語兒童習得中的表現，並將其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以及甘青漢語方言、晉語、西南官話中的複數標記“們”進行比較。我們對漢英多語兒童語料庫中漢語複數詞綴的考察發現，兒童語料中的“們”絕大部分附著於人稱代詞後，只有極個別出現在了普通名詞後。不同於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以及漢語學習者，多語兒童的漢語複數詞綴表達很有可能並未受到英語複數標記的影響。其原因在於 1 至 4 歲兒童所接收到的漢語名詞加複數詞綴的語言輸入太少，兒童尚未習得名詞加複數詞綴表示複數的普遍能產性規則，只是單純將這一結構作為整體詞彙來儲存。我們認為，甘青漢語複數標記“們”的表

現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相似，是因為二者的接觸模式相類似。甘青地區的漢語方言使用者受阿爾泰語和藏語影響，如二語學習者一般，將母語複數表達的特徵遷移至漢語普通話的“們”。這使得甘青漢語方言的“們”具有不同於普通話“們”的用法，不僅可以用於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也可用於無生名詞。而且由於普通話“們”在使用上的非強制性，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並沒能完全習得普通話“們”的用法，如同高水平的二語學習者一般。因此，這一用法便保留下來，形成了如今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複數標記“們”不同於現代漢語“們”的用法。同樣地，晉語中的複數標記與甘青漢語非常相似，因為晉語也受到了阿爾泰語的影響。而西南官話中的一些複數標記雖然可以用於無生名詞，卻不能與人稱代詞結合，是因為西南官話的複數標記源於複數指示詞語法化而非語言接觸。通過對比甘青漢語方言、晉語、西南官話以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漢英雙語兒童漢語中的複數標記，我們進一步揭示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與阿爾泰語等語言接觸時在微觀層面上發生的變化以及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比較漢語複數詞綴在不同接觸模式下的特徵，對其句法分析亦有啟示作用。

鳴謝

感謝兩位外審專家以及《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的寶貴意見，本研究曾在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上報告，收到了與會代表的指教。成文過程中，西北大學楊炎華老師也給出諸多建議，在此一併感謝。

參考文獻

- 丁加勇、沈禕。2014。湖南鳳凰話后置複數指示詞——兼論方言中複數標記“些”的來源。中國語文 5。418–423, 480。Jiayong Ding & Yi Shen. 2014. Hunan Fenghuanghua houzhi fushu zhishici: Jianlun fangyan zhong fushu biaoji “xie” de lai yuan. *Zhongguo Yuyan* 5. 418–423, 480.
- 胡光斌。2006。遵義方言名詞的語法特點及功能。遵義師範學院學報 8(1)。21–27。Guangbin Hu. 2006. Zunyi fangyan mingci de yufa tedian ji gongneng. *Zunyi Shifan Xueyuan Xuebao* 8(1). 21–27.
- 孔德然、趙楊。2021。日語、英語母語者漢語複數標記“們”的習得研究。世界漢語教學 35(4)。562–576。Deran Kong & Yang Zhao. 2021. Riyu, Yingyu muyuzhe Hanyu fushu biaoji “men” de xide yanjiu. *Shijie Hanyu Jiaoxue* 35(4). 562–576.
- 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研究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1996。臨夏方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Lanzhou Daxue Zhongwenxi Linxia Fangyan Diaocha Yanjiuzu & Gansusheng Linxiashou Wenlian. 1996. *Linxia Fangyan*. Lanzhou: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 李克郁。1987。青海漢語中的某些阿爾泰語言成分。民族語文 3。27–31。Keyu Li. 1987. Qinghai Hanyu zhong de mouxie A’ertai yuyan chengfen. *Minzu Yuyan* 3. 27–31.
- 李圃。2017。北方方言複數詞尾“們”與維吾爾語複數詞尾 -lar/ler 用法對比——北方漢語阿爾泰化又一例證。語言與翻譯 2。43–48, 69。Pu Li. 2017. Beifang fangyan fushu ciwei “men” yu Weiwu’eryu fushu ciwei -lar/ler yongfa duibi: Beifang Hanyu A’ertaihua you yi lizheng. *Yuyan yu Fanyi* 2. 43–48, 69.

- 李旭平。2022。再論量詞和複數標記不共現原則——從甘青漢語說起。當代語言學 24(6)。826–843。Xuping Li. 2022. Zailun liangci he fushu biaoji bu gongxian yuanze: Cong Gan-Qing Hanyu shuoqi. *Dangdai yuyanxue* 24(6). 826–843.
- 李豔惠、石毓智。2000。漢語量詞系統的建立與複數標記“們”的發展。當代語言學 2(1)。27–36, 61–62。Yanhui Li & Yuzhi Shi. 2000. Hanyu liangci xitong de jianli yu fushu biaoji “men” de fazhan. *Dangdai Yuyanxue* 2(1). 27–36, 61–62.
- 呂叔湘。1944。中國文法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üe*.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 敏春芳、李小潔。2023。語言接觸視角下甘肅臨夏話“們”的複雜用法。語言研究 43(2)。48–55。Chunfang Min & Xiaojie Li. 2023. Yuyan jiechu shijiao xia Gansu Linxiahua “men” de fuza yongfa. *Yuyan Yanjiu* 43(2). 48–55.
- 史秀菊、王海立。2024。晉語“們”類成分探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4)。2–11。Xiuju Shi & Haili Wang. 2024. Jinyu “men” lei chengfen tanyuan. *Shanx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7(4). 2–11.
- 孫錫信。1990。元代指物名詞後加“們（每）”的由來。中國語文 4。302–304。Xixin Sun. 1990. Yuandai zhiwumingci hou jia “men(me)” de youlai. *Zhongguo Yuwen* 4. 302–304.
- 太田辰夫。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Tatsuo Ota. 1958. *Zhongguoyu Lishi Wenfa*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trans. by Shaoyu Jiang & Changhua Xu. Beijing: Beijingdaxue Chubanshe.
- 汪化雲。2011a。方言指代詞與複數標記。中國語文 3。250–252。Huayun Wang. 2011a. Fangyan zhidaici yu fushu biaoji. *Zhongguo Yuwen* 3. 250–252.
- 汪化雲。2011b。省略構成的人稱代詞複數標記。方言 1。20–25。Huayun Wang. 2011b. Shenglüe goucheng de rencheng daici fushu biaoji. *Fangyan* 1. 20–25.
- 王浩銘、張和友。2022。從語言習得看“名詞+們”的使用規律與限制。澳門語言學刊 60(2)。40–48。Haoming Wang & Heyou Zhang. 2022. Cong yuyan xide kan “mingci + men” de shiyong guilü yu xianzhi. *Aomen Yuyan Xuekan* 60(2). 40–48.
- 韋志剛。2024。山西高平方言的複數標記“□”[·təu]。方言 1。88–96。Zhigang Wei. 2024. Shanxi Gaoping fangyan de fushu biaoji [·təu]. *Fangyan* 1. 88–96.
- 吳偉軍。2023。貴州安順方言複數標記“些”及“的些”的詞彙化。中國方言學報（第十期）。207–217。Weijun Wu. 2023. Guizhou Anshun fangyan fushu biaoji “xie” ji “de xie” de cihuihua.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dishi qi. 207–217.
- 武旭。2019。山西汾陽方言中的“們”。長安學刊 4。44–45。Xu Wu. 2019. Shanxi Fenyang fangyan zhong de “men”. *Changan xuekan* 4. 44–45.
- 肖黎明。1990。貴州省沿河話的“些”字。方言 3。223。Liming Xiao. 1990. Guizhousheng Yanhehua de “xie” zi. *Fangyan* 3. 223.
- 謝曉安、華侃、張淑敏。1996。甘肅臨夏漢語方言語法中的安多藏語現象。中國語文 4。273–280。Xiao'an Xie, Kan Hua & Shumin Zhang. 1996. Gansu Linxia Hanyu fangyan yufa zhong de Anduo Zangyu xianxiang. *Zhongguo Yuwen* 4. 273–280.
- 邢向東。2018。從幾種語法現象透視晉語對元白話的繼承和發展。語言暨語言學 19(3)。473–499。Cong jizhong yufa xianxiang toushi Jinyu dui Yuanbaihua de jicheng he fazhan. *Yuyan ji Yuyanxue* 19(3). 473–499.

- 徐丹。2011。漢語河州話及周邊地區非指人名詞的複數標記“們”。民族語文 6。9–23。Dan Xu. 2011. Hanyu Hezhouhua ji zhoubian diqu fei zhirenmingci de fushu biaoji “men”. *Minzu Yuwen* 6. 9–23.
- 徐丹、貝羅貝。2018。中國境內甘肅青海一帶的語言區域。漢語學報 3。2–15, 95。Dan Xu & Alain Peyraube. 2018. Zhongguo jingnei Gansu Qinghai yidai de yuyan quyue. *Hanyu Xuebao* 3. 2–15, 95.
- 楊炎華。2015。複數標記“們”和集合標記“們”。語言教學與研究 6。78–88。Yanhua Yang. 2015. Fushu biaoji “men” he jihe biaoji “me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78–88.
- 楊炎華、劉道海。2023。耀州方言複數表達形式。語言研究 43(1)。84–90。Yanhua Yang & Daohai Liu. 2023. Yaozhou fangyan fushu biaoda xingshi. *Yuyan Yanjiu* 43(1). 84–90.
- 楊炎華、桑紫宏。2023。再從“們”字談漢語語法的特點。當代語言學 25(3)。342–361。Yanhua Yang & Zihong Sang. 2023. Zaicong “men” zi tan Hanyu yufa de tedian. *Dangdai yuyanxue* 25(3). 342–361.
- 楊永龍。2014。青海甘溝話複數標記“們[mu]”的類型特徵及歷史比較。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八輯）。239–254。Yonglong Yang. 2014. Qinaighai Gangouhua fushu biaoji [mu] de leixing tezhen yu lishi bijiao.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ba ji. 239–254.
- 張莉、周兢。2009。漢語兒童平均語句長度發展研究。見周兢（編），漢語兒童語言發展研究：國際兒童語料庫研究方法的應用與發展，40–58。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Li Zhang & Jing Zhou. 2009. Hanyu ertong pingjun yuju changdu fazhan yanjiu. In Jing Zhou (ed.), *Hanyu Ertong Yuyan Fazhan Yanjiu: Guoji Ertong Yuliaoku Yanjiu Fangfa de Yingyong yu Fazhan*, 40–58.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 張芹。2020。山西屯留方言代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Qin Zhang. 2020. *Shanxi Tunliu fangyan daici yanji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張慶文、鄧思穎。2014。共性與差異：粵方言名詞短語研究。語言暨語言學 15(5)。733–760。Qingwen Zhang & Sze-Wing Tang. 2014. Gongxing yu chayi: Yuefangyan mingci duanyu yanjiu. *Yuyan ji Yuyanxue* 15(5). 733–760.
- 張曉靜、陳澤平。2015。河北武邑方言複數標記“們”。中國語文 2。153–157。Xiaojing Zhang & Zeping Chen. 2015. Hebei Wuyi fangyan fushu biaoji “men”. *Zhongguo Yuwen* 2. 153–157.
- Baayen, R. Harald & Antoinette Renouf. 1996. Chronicling the times: Productive lexical innovations in an English newspaper. *Language* 72(1). 69–96.
- Bardel, Camilla & Ylva Falk. 2007. The rol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Germanic syntax.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3(4). 459–484.
- Bardel, Camilla & Ylva Falk. 2012. The L2 status factor and the declarative/procedural distinction. In Jennifer Cabrelli, Suzanne Flynn & Jason Rothman (eds.),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ulthood*, 61–7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Cheng, Lisa L.-S. &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Guglielmo Cinque & Richard S.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259–292.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Houwer, Annick. 1998. By way of introduction: Methods in studies of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 249–263.
- Deng, Xiangjun & Virginia Yip. 2018. A multimedia corpus of child Mandarin: The Tong corpu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6(1). 69–92.
- Deuchar, Margaret & Rachel Muntz. 2003. Factors accounting for code-mixing in an early developing bilingual. In Natascha Müller (ed.), *(In)vulnerable domains in multilingualism*, 161–190. Amsterdam: Benjamins.
- Döpke, Susanne. 1998. Competing language structures: The acquisition of verb placement by bilingual German-Englis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5(3). 555–584.
- Fernández Fuertes, Raquel & Juana M. Licerias. 2010. Copula omission in the English developing grammar of English/Spanish bilingual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3(5). 525–551.
- Genesee, Fred, Elena Nicoladis & Johanne Paradis. 1995.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2. 611–631.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529–572.
- Hsieh, Miao-Ling. 2008.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Huang, Cheng-Teh James, Yen-hui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lk, Aafke & Natascha Müller. 2000.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syntax and pragmatic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3(3). 227–244.
- Iljic, Robert. 1994.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wo markers of plurality. *Linguistics* 32. 91–116.
- Jia, Gisela. 2003.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nglish plural morpheme by native Mandarin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6(6). 1297–1311.
- Jiang, Li Julie. 2017. Mandarin associative plural *-men* and NPs with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191–256.
- Koopman, Hilda. 1993.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ribution of pronominal DP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ardiere, Donna. 2009.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featur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5(2). 173–227.
- Lee, Thomas HT, Colleen H. Wong, Samuel Leung, Patricia Man, Alice Cheung, Kitty Szeto & Cathy SP Wong.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competence in Cantonese-speaking children*. Report of RGC earmarked grant 1991–94.
- Li, Xuping & Cuiping Cheng. 2025. Two types of plurality marker in Gan-Qing Mandarin: With reference to the Sanches-Greenberg-Slobin generalization. In Redouane Djamouri, Christine Lamarre & Julie Lefort (eds.), *Language contact in Northern China*, 283–311. Leiden: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750081> (accessed 12 Jan 2026).
- Li, Yen-hui Audrey. 1997.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nominal express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i, Yen-hui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75–99.

- MacWhinney, Brian. 2000. *The CHILDES project: Tools for analyzing talk*, vol. 2, *The databas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Mai, Ziyin & Virginia Yip. (under review). Tr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Leo Corpus.
- Mai, Ziyin, Ming Shang, Jing Liu, Shen Yan, Stephen Matthews & Virginia Yip. 2024. Acquiring Chinese in US, Hong Kong and Beijing: Three new corpora and three verbal struc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Study of Child Language (IASCL-2024), Charles University, 15–19 July.
- Maslen, Robert J. C., Anna L. Theakston, Elena V. M. Lieven & Michael Tomasello. 2004. A dense corpus study of past tense and plural overregularization in English.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7(6). 1319–1333.
- Mervis, Carolyn B. & Kathy E. Johnson. 1991. Acquisition of the plural morpheme: A case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2). 222–235.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awatmuang, Woramon. 2018. *Effects of positive evidence, indirect negative evidence and form-function transparency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L2 Chinese and L2 Thai*.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issertation.
- Ritter, Elizabeth. 1991. Two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noun phrases: Evidence from Modern Hebrew. In Susan Rothstein (ed.), *Perspectives on phrase structure: Heads and Licensing*, 37–6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omaine, Suzanne. 1995. *Bilingualism*,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Rothman, Jason. 2011. L3 syntactic transfer selectivity and typological determinacy: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7(1). 107–127.
- Rothman, Jason. 2015.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s for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TPM) of third language (L3) transfer: Timing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considered.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8(2). 179–190.
- Sandman, Erika. 2012. Bonan grammatical features in Wutun Mandarin. *Per Urales ad Orientem: Iter polyphonicum multilingue*, 375–387.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Schuler, Kathryn D., Charles Yang & Elissa L. Newport. 2016. Testing the Tolerance Principle: Children form productive rules when it is more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https://doi.org/10.31234/osf.io/utgds> (accessed 12 Jan 2026).
- Serratrice, Ludovica, Antonella Sorace, Francesca Filiaci & Michela Baldo. 2009. Bilingual children's sensitivity to specificity and genericity: Evidence from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2(2). 239–257.
- Simon, Camille & Camille Noûs. 2021. The grammaticalisation of plur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Amdo. Simon, Camille, and Camille Noûs. *Himalayan Linguistics* 20(3). 49–81.
- Tang, Chih-chen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ang, Jue & Bonnie D. Schwartz. 2022. Detecting definiteness: On the L2 acquisition of the Mandarin plural marker *-men*. In Ying Gong & Felix Kpog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46th Annual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vol. 2, 837–850.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 Wiltschko, Martina. 2008. The syntax of non-inflectional plural marking.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6(3). 639–694.
- 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Towards a formal ty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Charles. 2005. On productivity. In Pierre Pica, Johan Rooryck & Jeroen van Craenenbroeck (eds.), *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5*, 265–3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Yang, Charles. 2016. *The price of linguistic productivity: How children learn to break the rule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Yip, Virginia & Stephen Matthews. 2000. Syntactic transfer in a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3(3). 193–208.
- Yip, Virginia & Stephen Matthews. 2006. Assessing language dominance in bilingual acquisition: A case for mean length utterance differentials.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3(2). 97–116.
- Yip, Virginia & Stephen Matthews. 2007. *The bilingual child: Early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aretsky, Eugen, Benjamin P. Lange, Harald A. Euler & Katrin Neumann. 2016. Factors considered and ignored in plural acquisition: Frequency rule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8(2). 283–313.
- Zhang, Qingwen & Sze-Wing Tang. 2010. Cl–NP phrases in five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and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Harvard University, 20–22 May.

Different Behaviours of the Chinese Plural Marker under Different Contact Scenarios

Zetao Xu and Victor Junnan P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adopts corpus method to examine whether Chinese plural marking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is influenced by English.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like Mandarin speakers from Gan-Qing areas and Mandarin learners, the Chinese plural marking in bilingual children is almost not influenced by English. This is because at the age of 1–4, children have not yet acquired the rule of adding plural affixes to nouns to indicate plurality, but instead have acquire words as whole lexical items. The current study also compares the expression of plurality in Ganqing Mandarin, Jin Chinese, Southwestern Mandarin,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Chinese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further revealing the micro-level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Chinese spoken in Ganqing area during its contact with Altaic languages.

Keywords

plural marker,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dialect, corpus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電郵地址：zetaoxu@link.cuhk.edu.hk（徐澤韜）

victorjunnanpan@cuhk.edu.hk（潘俊楠）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3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1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月2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

